

中国古代疫病流行年表

张志斌
撰



中国古代疫病流行年表

张志斌 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古代疫病流行年表/张志斌撰. —福州: 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7. 9
ISBN 978-7-5335-2981-9

I. 中… II. 张… III. 传染病—中国—前 674 年~1840—
年表 IV. R51-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49220 号

书 名	中国古代疫病流行年表
作 者	张志斌
出版发行	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邮编 350001)
网 址	www.fjstp.com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排 版	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排版室
印 刷	福州华悦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毫米×1168 毫米 1/16
印 张	16.75
插 页	2
字 数	518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2 000
书 号	ISBN 978-7-5335-2981-9
定 价	36.00 元

书中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直接向本社调换

自序

我没有先知先觉的能力，不是预言家。但是，20年前我在硕士论文中的一段话，却不幸而言中：

疫病，是中国古代对人民的健康与生命摧残最甚的一类疾病，在各种文史资料及医学书籍中留有许多触目惊心的沉痛记载。在医学高度发展的今天，我国由于“预防为主”卫生方针的贯彻，爱国卫生运动的展开及各项防疫措施的实施，使疫病杀人如麻的猖獗气焰已被遏制。但是，人类与疫病的斗争将会继续下去，防疫事业尚有漫长的路程。这不仅是中国人的问题，也是世界面临的问题。

2003年，我国突然发生的急性重症呼吸综合征（SARS，非典型肺炎，简称“非典”）流行，此前此后又出现的多种新发变异性病毒性传染病，仿佛在诠释我上述的话，再次证实了疫病仍在危害着人类的健康，甚至威胁着人类生命这样一个严酷的事实。

疫病，这个古老的幽灵，并不因科学昌明而隐退，它同样与时俱进，仍然徘徊在现代社会，伺机而动，再次吞噬人类的生命。近些年来，除SARS之外，还出现爱博拉病、禽流感等疫病，这就把一个更为严峻的问题放到人类的面前，那就是现代人工免疫手段的发展永远赶不上病毒的变异。“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曾经使人类在疾病面前无比自信的现代医学，正面临着最为无奈的考验。而中医学治疗传染病的特色恰恰是不重在抓病原，而重在抓住人体对疫病的反应状态。这里的病原当然是指西医所说的病原（细菌、病毒等微生物）。所以，中医可以在西医病原不明的紧急状况下，运用中医原创思维的理论 and 实用有效的治法从容应对。这一点通过中医治疗SARS的实践，已经引起了世界医学界的关注。

中医治疗传染病的优势建立在数千年抗疫经验的基础上。因此，对中国古代的疫病流行概况作一些较为系统的了解，对当时影响疫病流行的主要因素作一些较为客观的分析，不仅可从中获得某些规律性的揭示，对我们今天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如何与疫病作斗争也提供了一些有用的借鉴，而且也可以为中医学的发展提供背景材料，使人们更为深刻地了解到中医学是如何在与疫病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她的那些独特的思维是如何产生的，以及她的产生与发展对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本着这样的目的，1984年，本人师从导师李经纬教授研究疫病史，并以《影响古代疫病流行诸因素初探》作为我的硕士学位论文题目，直接切入疫病流行的社会史研究。那是一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没有信息检索系统的年代，在浩如烟海的文献中，搜寻收集古代疫病流行的资料是异常艰苦的过程。这还不算是最痛苦的，20年前我开始做此项研究时，那种学术寂寞真的非常难耐——周围没有第二个人与我有着共同的兴趣。就像十几年后余新忠先生在他的大作《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文所说的那样：“张志斌对古代疫病流行因素的探索颇为引人注目……就医史学界来说，她的研究实在可以说是洞开了一个新的研究天地。”^{〔1〕}

〔1〕 余新忠：《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29

作为一个医史学界古代疫病社会史研究的先行者，固然需要信念支撑，但更需要勇气和耐得寂寞的定性。当时的我只是初涉“历史”这样一个严肃学科的医学生，而那时信息检索又不像现在这样便捷。所以我对当时的医史学界，以及历史学界是否有人在做医学社会史的研究，可以说是一无所知。也许正是得益于这种一无所知的懵懂状态，我才可能不畏艰苦与艰巨，一点一滴地从文、史、医籍的海洋中去打捞资料，毫不在乎自己所下的工夫是如何笨拙与痴迷。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真是应了一句古话——“初生牛犊不怕虎”。一个在“文革”中读完中学，之后又只在中医学院学完了中医学课程的年轻人，对历史、地理知之甚少，竟然敢做这样的一个论题！好在我就读的中国中医研究院（现称“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中，有许多全国知名的学者、真正的医史文献学大家，如马继兴、李经纬、蔡景峰、余瀛鳌诸先生，他们都真正地具有诲人不倦的精神。无论我提出多么幼稚可笑的问题，也能得到十分耐心而有效的回答与指点。还有早我几届的大师兄、大师姐，交流起来就有了更多的方便。因此无论何时何地，只要逮住了机会，就可以与他们山高水远地神侃一番。说实在的，没有这样的环境，没有这样的帮助，就凭我当时知识结构，要完成那样一个论题，确实是有困难的。

经过了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三年，在必须通过毕业论文答辩的压力与老师们无私的帮助下，我完成了学术上一次破茧成蝶的涅槃。所获得的真正成果是我翻阅了百种以上的古籍，从中爬梳出来的一千多条关于古代疫病流行的资料。依托这些资料形成了一个《中国古代疫病流行年表》（此后简称《年表》）。此时剩给我写论文的时间已经短得只是一个极限。但是根据这个《年表》，我在很短的时间里，顺利地写成了我的毕业论文——《影响古代疫病流行诸因素之初探》。该文当年作为医史文献专业惟一出线的研究生毕业论文获得中国中医研究院的“何时希优秀奖”。后来，该文主要部分发表于1990年《中华医史杂志》上，也就是前述余新忠先生提到的目前为历史界所了解的那篇论文^{〔1〕}。

而事实上，当时真正受欢迎的并不是这篇急就章的论文，而是我出大力、流大汗完成的《年表》。我认为体现了我观点的论文，花了老师的大价钱铅印了70份，而我认为只不过是资料的年表，只请我弟弟（他有一手漂亮的字）帮忙刻蜡纸油印了30份。说起来有一点点悲哀，供不应求的竟是那初看起来“卖相”极差的年表。有一位没拿到年表的朋友甚至责备我：“你完全搞反了，论文不用那么多，年表应该多印点。”

1987年硕士毕业之后，为了与年仅半岁的女儿生活在一起，我回到了老家浙江衢州。此后，我做了8年的一线临床大夫，直至拿到了临床高级职称，有了挂牌专家门诊的资格。但是我却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我割舍不下的是医史学专业，是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那张无人喝彩的冷板凳。于是，再次在朋友们“活到老，考到老”善意嘲讽声中，1995年我报考李经纬老师的博士研究生，重新回到医史学研究队伍。

1998年，我完成博士学业后，环视中外疾病史的研究，十分惊喜地发现“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文史界竟然涌动着医学文化史的研究热潮。很多文史学者，从社会文化的角度切入医学现象的研究，瘟疫的流行与防治尤其成为他们关注的重点。此后，我又荣幸地结识了这一领域中的国内外部分学者（如文树德教授、梁其姿教授、余新忠博士等等），读到了他们的一些好作品。这些作品与我的“由内到外”——由医学到社会文化——的做法正

〔1〕 张志斌：影响古代疫病流行诸因素初探。中华医史杂志，1990，20（1）：28-35

好相反,是“由外到内”——由社会文化到医学——进行研究。我为此受到的震动不可谓小,受到的启发不可谓浅,也深感在学术领域不再孤单寂寞。

最近,我荣幸地接受邀请,参加由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主办的“社会文化视野下的中国疾病医疗史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这是国内外医史学界与文史学界学者第一次坐在一起进行直接对话的学术会。在会上,我聆听了很多文史界学者发表了他们对医学现象的研究与分析,而且还因此而了解到了文史学者对医史学者的某些期望。会上有一篇论文,利用了9条“有时间可考的”唐代疫病流行资料,洋洋洒洒地写了几千字的文章。这使我想到了自己的这些年不断在不同的课题中得到修正的年表,该是正式出版问世,交给更多学者去使用的时候了!

近些年来,关于医学史的研究,有两种不同的研究方法,一种被称为“内史”研究,一种被称为“外史”研究。前者就是我们医史学界几代人兢兢业业做了近百年的事业,而后者是近一二十年兴起的、以中外文史学者为主力的一个方兴未艾的新潮流。这是医史研究互为表里、互动互补的两个方面,内外合力,可以把医史研究推向纵深。我在20年前无意中从事了一项内外史结合的疫病流行研究,完成了中国第一份《中国古代疫病流行年表》(以下简称“《年表》”)。虽然这项工作包涵了考证研究,但其主体是一个资料性很强的文本。在医史学者手里,可以用于“由内向外”的研究;被文史学者掌握,又可以“从外向内”地进行研究。如果将此表公之于众,实际上可以为许多研究者节省一些时力,免除像我当年所花费的那种痛苦而茫无头绪的搜剔爬梳经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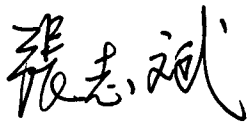
另一方面,由于2003年SARS的突然袭击,使政府与学界都开始重视瘟疫流行的问题,我当年的学术寂寞状况已不复存在。近几年,我参与了不同的课题,如国家“863”计划项目“中医学关于SARS发病证候演变规律与治疗方案研究”(2003AA208107)与科技部的基础性课题“中国古代疫病流行的时空分布规律研究”(2004DIB1J032),疫病流行年表所反映的古代疫病流行情况使合作者们均感到有很大的兴趣。可以说,就古代疫病流行资料的广度与力度来看,我很自信目前还没有已经公开发表的文著能够超过我的《年表》。或者说,经过我最新修订的《年表》还可以为更多的研究者提供研究的资料依托。为了更好地达到这个目的,我在做最后一次修订的时候,同时还做了另外的两份工作,一是按照同样的时间顺序把《年表》中除了地方志之外的资料逐一落实,形成“中国古代疫病流行年表的资料长编”;二是对《年表》所涉及的古地名进行一些必要的考证与注释,形成“疫病流行年表古地名备考”。另外,在课题研究中,我本人基于《年表》资料,在医学史或医学社会史及中医温病理论研究方面发表了一些论文。我将这些论文及观点综合到一起,形成一个专篇,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因此,这次《年表》成稿时,包括了四方面的内容,即:第一章“中国古代疫病流行年表”;第二章“疫病流行与中医瘟疫理论创新的研究”;第三章“中国古代疫病流行年表的资料长编”;第四章“疫病流行年表古地名备考”。而年表中的地方志资料引用日本人井村哮全《地方志所载之中国疫病考》之第一篇《疫病年表》,此文原文刊登在1936年日本的《中外医事新报》1233号上,目前已不易查找。为了方便读者的使用,我以附件的方式将此文与本书相关部分的中文节译附在书后。

当然,我做的《年表》仍然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关于《年表》中尚存在的问题,我将会在本书“绪论”中自我解剖),但我还是想把它奉献给更多的学者使用,请更多的学者来帮助我完善它。余新忠先生曾指出我1990年发表在《中华医史杂志》上的文章“从历史学的

角度看，她的统计和分析尚不够细密”^{〔1〕}。因此我更希望将此《年表》以及我的一些想法提供给文史界的学者，欢迎他们利用历史学知识，作出更为细密的统计与分析。这对于我当年及其后为此所付出的那些艰辛，岂不是最好的回报？

最后，我要向我的导师李经纬先生在我做毕业论文期间对我的悉心指导表示感谢！要向我们所给予我帮助与指导的其他老师表示感谢！要向在自由讨论与交流中给予我灵感与启发的师兄弟们表示感谢！要向在我做最后一次修订时，在资料核实及日文中译方面帮我做了大量工作的三位研究生表示感谢！

是为序。



2006年11月16日于北京

〔1〕 余新忠：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30

王 序

“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此言史可为鉴。当今治疫与防疫，亦当温故知新，医者采其良法，民众借其经验。先秦以降，学人、医者，论“疫”甚详。《内经》云：“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民必大疫，又随以丧”，此言瘟疫肆虐，发病广泛，传播迅疾，伤亡惨重，确系人类大敌。反观古代中医防疫之理念，治疫之举措，博大精深，内容宏富。故我国历代虽频发大疫，荼毒百姓，然经奋力防治，尚未导致民族迁徙或人口骤降。历代抗疫防疫之感人事迹，世代相传。中华民族繁衍昌盛，得益于古代中医造福桑梓，其功不可没。

当今一则是“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飞船、潜艇，标示科技之发达；另则却是“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虫菌疫毒，如野火死灰，得风复燃。曾几何时，变异冠状病毒作祟，导致民众恐慌一时。政府、医界，联袂奋力抗击，数月即平。后期中医参与防治，虽不贪功，然令世人得知，国医国药防治现代大疫之效仍是无可替代。中医药学防治重大疫病的作用再次得以彰显。吾辈深感毛泽东主席拟定卫生方针与中医政策之伟大。“中医不能丢”、“中西医并重”，确实英明！华夏医药，历数千年，其天地人相参、精气神一体的系统论，是中医的原创思维。此原创优势，自当我主人随，加以弘扬光大。当今世界，艾滋病流行、结核病反弹、病毒病增多。西人制定“生物盾”计划，探求新致病原及变异病毒防范策略与方法，也将吸纳东学作为途径之一。然攻毒之先，首当强身。防则强化自身免疫功能，治当坚持证为主体，据证言病，病证结合，方证相应，以提高防治水平。

张志斌教授对学术勤于耕耘，刻苦钻研，学风严谨；对学生诲人不倦，重道求真，为人师表；其早年从事临床，精于诊务；后来从事中医历史研究，又获博士学位。近著《中国古代疫病流行年表》，可作为深入研究古代疫病流行之工具书。该书阐发作者对瘟疫理论与实践的研究，不乏创新见解，颇多真知灼见。我于1998年调任中国中医研究院（即今中国中医科学院）后，与张教授相识，切磋学问，多受启发。今日其书稿即将付梓，邀余作序，感念治学中互勉互助，故聊以数语，乐观厥成。

中国工程院院士

王永炎

丁亥春，于中国中医科学院

目 录

绪 论	(1)
一、疫病的含义及范围	(1)
二、疫病流行资料调查方法	(2)
三、疫病流行年表标注方法	(3)
四、年表相关统计与分析方法	(3)
五、年表相关问题说明	(3)
六、原始资料的提供方式	(4)
七、关于古地名备考的说明	(4)
第一章 中国古代疫病流行年表	(6)
第二章 疫病流行与中医瘟疫理论创新的研究	(106)
第一节 影响古代疫病流行的主要因素	(106)
一、社会政治因素	(106)
二、地理环境因素	(110)
三、中外流通因素	(113)
四、其他因素	(116)
第二节 古代疫病流行的综合讨论与启示	(120)
一、各主要因素间的相互关系及权重	(120)
二、古代疫病流行给予今天的启示	(123)
第三节 关于古代中医瘟疫理论创新发展的分析与思考	(130)
一、中医在防治瘟疫方面起到重要作用	(130)
二、疫病流行与中医瘟疫理论创新的相关性研究	(131)
三、中医瘟疫理论的辨病与辨证	(132)
四、中医瘟疫理论的特色	(137)
五、20 世纪 50 年代中医治疗流行性乙型脑炎的经验思考	(139)
六、2003 年中医治疗 SARS 的经验思考	(141)
七、中医瘟疫理论的创新发展的规律探讨	(143)
八、中医瘟疫研究面临的新挑战与新机遇	(144)
第三章 中国古代疫病流行年表资料长编	(146)
第一节 先秦及秦汉魏晋南北朝	(146)
第二节 隋唐五代	(160)
第三节 宋金元	(165)
第四节 明	(176)

第五节 清	(182)
第四章 中国古代疫病流行年表古地名备考	(192)
附 中国古代疫病流行年表古地名字头索引	(192)
附录	
地方志所载之中国疫疠略考（节译）	(230)

绪 论

疫病,是中国古代对人民的健康与生命摧残最甚的一类疾病,在各种文史资料及医学书籍中留有许多触目惊心的沉痛记载。在医学高度发展的今天,我国由于“预防为主”卫生方针的贯彻,爱国卫生运动的展开及各项防疫措施的落实,疫病杀人如麻的猖獗气焰已被遏制。2003年,一场突如其来的SARS使医学界经受了严重的考验,并催人反思许多医学和社会问题。曾几何时,由于抗生素发明所引起的激动,使人们几乎产生了疾病将被征服的错觉。但是近年来,不断出现的突发性病毒性传染性疾病,重新把传染病对人类健康与生存的威胁推到了世人的面前,使人们认识到,人类与疫病的斗争将会继续下去,防疫事业尚有漫长的路程。因此,对中国古代的疫病流行概况作一些较为系统的了解,对当时影响疫病流行的主要因素作一些较为客观的分析,从中寻求某些规律性的揭示,对我们今天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如何与疫病作斗争,无疑能提供一些有用的借鉴。

一、疫病的含义及范围

(1) 疫的最初含义——伤亡严重,发病广泛:“疫”最初见于先秦著作。《礼记·月令》:“民殃于疫。”^{〔1〕}“民必大疫,又随以丧。”^{〔2〕}指出疫病的伤亡损害比较严重。许慎《说文解字》提出:“疫,民皆疾也。”^{〔3〕}“皆”字说明疫之发病具有一定的广泛性。这种广泛性是否与传染有关,在当时的著作中找不到更充足的理由来肯定或否定。由于传染病的发病也具有广泛性,所以疫病包括了传染病在内,但可能并不局限于传染病。

(2) 疫的传染特征论说:较早提出“疫”之传染性的是晋代葛洪《肘后方》:“温疫,转相染著至灭门,延及外人。”^{〔4〕}隋代《诸病源候论》认为疫病传染性很强,“如有鬼厉之气。”^{〔5〕}另外认为出自宋人补入《黄帝内经·素问》的《刺法论篇》中也指出:“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6〕}可见,宋以前文献已经十分明确地点出了“疫”的传染性。此后更多的医家阐述了时疫的传染性。如吴有性《温疫论》说:“时疫能传染于人。”^{〔7〕}“病偏于一方,延门阖户,众人相同。”^{〔8〕}熊立品《瘟疫传证汇编》说:“阖境延门,时气大发,瘟疫盛行,递相传染。”^{〔9〕}杨璿《寒温条辨》说:“凶年温病盛行,所患者众,最能传染人,皆惊恐呼为瘟疫。”^{〔10〕}莫枚士《研经言》说:“疫者役也,传染之时,病状相若,如役使也。”^{〔11〕}叶霖《增订伤暑全书》按语所论更为明确:“疫者,犹徭役之谓,大则一郡一城,小则一村

〔1〕 孔丘.礼记正义·月令.见:阮元.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1370

〔2〕 孔丘.礼记正义·月令.见:阮元.十三经注疏.卷十七.北京:中华书局,1980.1383

〔3〕 许慎.著.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350

〔4〕 葛洪.肘后方.见:王焘.外台秘要.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5.130

〔5〕 巢元方.诸病源候论.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5.64

〔6〕 佚名.黄帝内经·素问.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63.581

〔7〕 吴有性.温疫论.崇实书局光绪戊申(1908年)刊本.二十二叶

〔8〕 吴有性.温疫论.崇实书局光绪戊申(1908年)刊本.一叶

〔9〕 熊立品.瘟疫传证汇编.卷6.松园先生家塾藏版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刊本

〔10〕 杨璿.伤寒温疫条辨.卷1.上海:上海大东书局,民国二年(1912年).十一叶

〔11〕 莫枚士.研经言.卷2.光绪五年(1879年)月河莫氏初刊本.十叶

一镇，比户传染……如不传染，便非温疫。”^{〔1〕}

(3) “疫”的同义名词：

疠 汉以前，“疠”的含义要更广一些。除了与“疫”同义之外，还泛指比较痛苦而顽固的各种疾病，并特指一种具体的病，可能是麻风病。在较为后期的各种著作中，“疠”与“疫”的含义逐渐趋于一致，并多有“疫病”并称。如东汉王充《论衡·命义篇》：“温气疫病，千户灭门。”^{〔2〕} 隋代巢元方《诸病源候论》：“病无长少，率皆相似，如有鬼厉之气，故云疫病病。”^{〔3〕} 至清代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时，“疠”的词义已明显缩小，段氏注“疠”曰：“按古义谓恶病，包内外言之，今义别制。‘癰’字训为‘恶疮’，训‘疠’为‘疠疫’。”^{〔4〕} 至此，“疠”与“疫”已几无区别。

伤寒 汉魏六朝伤寒与温疫常混称，皆为伤害极大的时令传染病或流行病。张仲景《伤寒论·序》：“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5〕} 陈延之《小品方》：“古今相传称伤寒为难疗之病，天行温疫是毒病之气，而论疗者，不别伤寒与天行温疫为异气耳。云伤寒是雅士之辞，云天行温疫是田舍间号耳，不说病之异同也。”^{〔6〕} 巢元方《诸病源候论》：“伤寒之病……若因岁时不和，温凉失节，人感其乖戾之气而发病者，此则多相染易。”^{〔7〕}

温病 温病既是相对于伤寒而言的一类发病季节不同的时令病，又是温疫的异称。葛洪《肘后备急方》：“其年岁中有疠气，兼挟鬼注相注，名为温病。”^{〔8〕} “人感乖戾之气而生病，则病气转相染易，乃至灭门，延及外人。”^{〔9〕} 说明温病也是由疠气引起的、具有传染性的疾病。

时气 时气指症状相似的一类流行性发作的时令病。巢元方《诸病源候论》：“一岁之中，病无长少，率相似者，此则时行之气也。”^{〔10〕} “夫时气病者，此皆因岁时不和，温凉失节，人感乖戾之气而生病者，多相染易。”^{〔11〕} 他还进一步指出：“疫病病候，其病与时气、温热病相类。”^{〔12〕} 所以，在古代，疫、疠、时气、温病、伤寒等等，有时候是混称的。

此外，在历代医学著作及后期地方志中，对属于疫病范围内的疾病尚具有一些其他的或较为具体的名称。但其共同点是具有传染或流行特性，伤害较重。如宋、元、明、清著作中的“痘”、“大头瘟”、“羊毛瘟”、“疙瘩瘟”、“虾蟆瘟”、“烂喉痧”、“吊脚痧”、“鼠疫”等。

二、疫病流行资料调查方法

本研究在系统地考查了文史、医学等各种现存文献中的疫病流行相关资料的基础上，对资料进行归纳、整理，力求通过系统地掌握中国古代 2500 多年有文字记载的疫病流行情况。诚如上述，中国古代文献中，疫病称谓不一，因此在资料调查中，要注意到各种具有疫病含义的名词。

(1) 在文史书籍中，记载疫病流行绝大多数直接用“疫”、“疫病”之名称，凡如此者，一律收入。医学著作中直接以“疫”、“疫病”记录者，亦均以收入。

〔1〕 张鹤腾，撰。叶霖，增订。增订伤寒全书·卷2。见：裘庆元，辑。《珍本医书集成》第七册。上海：世界书局，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十叶

〔2〕 王充。论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17

〔3〕 巢元方。诸病源候论。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5.64

〔4〕 许慎，著。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385

〔5〕 张仲景，著。成无己，注。注解伤寒论·伤寒卒病论·序。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63.7

〔6〕 陈延之。小品方。见：王焘。外台秘要。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5.59

〔7〕 巢元方。诸病源候论。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5.52

〔8〕 葛洪。肘后备急方。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6.33

〔9〕 巢元方。诸病源候论。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5.64

〔10〕 巢元方。诸病源候论。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5.53

〔11〕 巢元方。诸病源候论。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5.57

〔12〕 巢元方。诸病源候论。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5.64

(2) 以其他名称或具体病名记录者, 凡是已被确认为是传染病者, 如“痘”——天花、“吊脚痧”——霍乱等等, 一律收入; 不确定者, 如“伤寒”、“时气”等等, 则注意到具有明显的传染或流行及伤亡较重特点时, 方予以收入。

(3) 具有地方病特征的记载, 一般不予收入。当此病由于人口迁移等原因形成地方外流行时, 则予收入。例如瘴疫, 局限于岭南之记载不予收入, 而如果由于战争等原因将瘴疫带出岭南地区形成其他地区的流行, 则予收入。理由是地方病在采取有效预防措施之前, 往往具有连续长期存在的特点。例如岭南地区终年气候温暖, 按蚊无越冬期或仅有短暂的滞育期, 疟疾几乎全年传播而无休止期。因此, 史书中关于岭南地区瘴疫流行的记载并不能说明实际流行情况, 事实上, 只是一定程度地反映了外地人进入岭南的次数。

三、疫病流行年表标注方法

在《年表》中, 关于流行年有一些本年表特有的标注符号, 解释如下。

(1) 某年~某年: 数年中均有疫病流行, 即连年流行。

(2) 某年(~某年): 数年中有过疫病流行, 并非连年流行, 而是确切的年份难定。前者该次流行的起始, 后者是该次流行的终止。

(3) ←—某年: 该年为该次流行的终止, 而起始年不详。

(4) 某年—→: 该年为该次流行的起始, 而终止年不详。

四、年表相关统计与分析方法

本书第三章第二节是对影响古代疫病流行的主要因素的研究分析。在这一节中, 会涉及疫病流行频数统计与分析。在古代文献记载中, 关于频次的记载是比较模糊的, 因此需要有一个前后一致的统计方法。

(1) 统计方法: ①相对独立的某年某地疫病流行作一次计算。②连年的某地疫病流行, 中间未有间断, 作一次计算。③同年, 或相同的连续某几年内, 多地同时有疫病流行, 作一次计算。④自始至终保持以上三条统计标准。

(2) 分析方法: 以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 将各种文献资料置于当时当地的文化环境中认识与讨论, 通过对瘟疫流行状况的分析、瘟疫理论的内涵及其发展的特点与规律的研究, 寻求古今瘟疫发病特点与瘟疫理论差异, 提出可供现代瘟疫研究借鉴的结论与意见。

五、年表相关问题说明

需要说明的问题有两点。

其一, 此项研究得益于祖先优良的记史传统。历代史家客观记载历史上的灾变(包括天文灾象、疫病、地震等), 为后世积累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完整连续的 2500 多年的疫病流传文字史料。历代文献为系统研究古代疫病流行提供了可能与条件。因此, 必须说明的是, 中国古代这种疫病流行情况与任何其他无文字历史可以考查的国家毫无可比性。

其二, 本书所引用的地方志资料来自日本人井村喙全的《地方志所载之中国疫病略考》(原载于 1936 年日本《中外医事新报》1233 号)。此文与本书年表相关内容的中文节译本见书后附录 1。本人并未以井村先生提供的线索逐一核对地方志原文, 其原因有多种。首先, 这当然是出于对井村先生文献考证功夫的信任; 其次考虑到地方志疫情资料对本年表的作用, 疫病流行的地方志资料集中在明清, 其中记录的明清以前的疫情实际上大多取自此前的正史, 至明清之时, 正史重大疫情的记录已经比较完备, 因此明清地方志疫病流行资料进入年表, 固然可以使此时疫情发生的频率曲线再增高若干, 但并不会影响此时疫病流行曲线整体的走向; 再者, 地方志资料浩瀚如海, 仅凭我个人能力实在是很难在其中随意徜徉。综上所述多种原

因,本文所引地方志资料直接以井村喙全之文为本(关于引录的方式见下文)。

六、原始资料的提供方式

在本书“自序”中提到,为了方便读者的使用,将以长编与附录两种方式为读者提供本《年表》相关的所有原始资料。

其一,“中国古代疫病流行年表资料长编”提供除地方志资料之外的“年表”每一个条文的原始资料及其出处。这部分资料将与“年表”的时间同序,且同样以公元年为标题,严格按照文献标注规范方式,给出包括著作年代、作者、书名(及丛书名)、卷次、出版地、出版社、出版年、原文所在页码及原文等九项内容在内的资料长编。在资料长编中,完全按照原有文字给出原始资料,即使发现原书文字有误,也不予修改,以免因本人考证有误,反而误导了读者。另外,也可为其他学者提供再次考证的方便。

其二,把日本人井村喙全《地方志所载之中国疫疠略考》与本《年表》相关资料的中文节译附录于书后。该文在印刷时约有20个地名有误,且同样的错误在文中反复出现。如贵池误作“贵地”、获嘉误作“护嘉”、杞县误作“杞县”、荥泽误作“荣泽”、沂州误作“沂州”、湘潭误作“湘泽”、颍县误作“颖县”、菏泽误作“荷泽”、临颖误作“临颖”、宜兴误作“宣兴”、蒲圻误作“蒲折”等等,在此不一一列举。本次转录将对其文中与地名相关的错字予以纠正,并在每一个错字首次出现时给出脚注,说明原文字及修改的理由。此外,该文的所使用的年表可能有误,多处出现与实际纪年相差一年的情况,今在节译中仍存其旧,而本年表中则改为正确的时间。

七、关于古地名备考的说明

本书第四章“中国古代疫病流行年表古地名备考”,主要是想为读者提供关于古今地名对照的参考,实际上也包括了本人关于地名的考证研究。本章地名内容主要以史为乐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辞海》(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及中国历史地图集编辑组编辑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上海:中华地图学社,1975)等著作为依据。在史书非《五行志》中出现的疫病流行资料,常常并不涉及流行地点,必须根据上下文来考查。此外,还有同名异地,必须结合地名沿革及疫情流行地区甄别确定。最为费时费心的是正史书籍中有时也会意外地出现用字错误。这样情况不一而足,涉及书种也有好几种。笔者根据以上参考书,并结合疫情可能波及的地区范围等,进行如下考证。

(1)《魏书》:据魏收《魏书》卷105之3《天象志》第3〔北京:中华书局,1974.2399〕:“泰常五年,时官军陷武牢,会军大疫,死者十二三。”据考,“武牢”乃山名,在今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西南,不在北魏境内。而同书《太宗明元帝纪》载:泰常八年(423年)“夏四月丁卯,幸成皋城,观虎牢……虎牢溃……士众大疫,死者十二三。”比勘史载,当以“虎牢”为是,“武牢”乃笔误。

另有一说,唐代避李渊祖父李虎之讳,改“虎牢”为“武牢”。而《魏书》中多处“虎牢”、“武牢”双出,可能是因为《魏书》虽成书于北齐,但不久即部分散佚,后世以他书补入,可能此处系据唐人之书所补。

(2)《新唐书》:据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36《五行志》三第26〔北京:中华书局,1975.956〕:“(贞观)二十年,卿州大疫。”考唐代无“卿州”之地名,而有“乡(乡)州”,此当为原著因形近而误。

(3)《明史》:据张廷玉等《明史》卷28《五行志》第4〔北京:中华书局,1974.442,443〕:“正德元年六月,湖广平溪、清凉、镇远、偏桥四卫大疫,死者甚众。靖州诸处自七月至十二月大疫,建宁、邵武自八月始亦大疫。”考明代湖广无“清凉卫”,但有“清浪卫”,正与平溪、镇远、偏桥三卫相邻。据此判断,“清凉”当为“清浪”之误。

(4)《清史稿》:据赵尔巽等《清史稿》卷40《灾异》1《志》第15〔北京:中华书局,1977.1528,1529〕:“(雍正)五年……冬,汉阳疫,黄冈大疫,钟祥、榆明疫。”考清代无“榆明”地名,据同年《榆次县志》载“榆次大疫”。而榆次与黄冈、钟祥同属湖北境内。据此判断,“榆明”当为“榆次”之误。

类似情况尚有一二，不赘列。此外，还有的疑问不易考定。如：

(5)《元史》：据宋濂《元史》卷 51《五行志》二第 3 下〔北京：中华书局，1976. 1111〕：（至正）“十九年春夏，鄜州并原县，莒州沂水、日照二县及广东南雄路大疫。”据考，未见元代鄜州领有并原县。鄜州治所在杏城（今陕西黄陵县西南五里）。无论唐、宋，其所辖之县（例如今陕西富县、甘泉、洛川、洛交、直罗等）均无“并原县”。《续文献通考》卷 228《物异》引此段，作“鄜州三原县”，三原县治所在今陕西三原县，虽与鄜州相近但不相邻，自古不属鄜州所辖。故《元史》所载“鄜州并原县”尚待考证。

在每一个古地名之后，将用括弧给出这一地区在年表中所记载的疫病流行年份。也就是说，括弧中给出的公元年越多，说明此地有过的疫病流行次数越多。并可以此公元年为线索，在年表或资料长编中核实该地区疫病流行的疫情。

第一章 中国古代疫病流行年表

说明

(1) 年表标注方法见绪论。

(2) 年表中的疫情均为引文，惟原文无疫情说明时，用“(疫)”表示。地方志疫情原文来自于资料来源中所给资料的第一种。

(3) 年表中的年份与地点，大部分来自原文直接引用，少部分原文没有直接标注者，据上下文义推测。时间无考时，放弃资料；地名无考时，注明“地名无考”。表中所有的历史地名都可以在本书第四章“中国古代疫病流行年表地名备考”中查找对照。

(4) 表中除地方志以外资料，每条资料均于本书第三章“中国古代疫病流行年表的资料长编”中以同样时间顺序给出参考文献出处。地方志资料引自于日本人井村喙全的《地方志所载之中国疫病略考》之第一篇《疫病年表》，此篇与本书相关部分的中文节译见本书后附录。

公 元	干 支	朝 代	年 号	疫 情	地 点	资料来源
前 674 年	丁未	东周 惠王姬阎	三年（鲁庄 公二十年）	夏，齐大灾。大灾者 何？大瘠也。大瘠者 何？痢 ^{〔1〕} 也。	齐国境内	《春秋公羊传注 疏·庄公》卷 8
前 655 年	丙寅	东周 惠王姬阎	二十二年	二十二年，大疫。	赵国	《史记》卷 43《赵 世家》第 13
前 369 年	乙酉	东周 烈王姬喜	七年	民大疫。	秦国	《史记》卷 15《六 国年表》第 3
前 277 年	甲申	东周 赧王姬延	三十八年	赧王三十八年，赵 大疫。	赵国	《永年县志》、《邯 郸县志》
前 243 年	戊午	秦始皇 嬴政	四年	天下疫。	秦国	《史记》卷 6《秦 始皇本纪》第 6
前 221～ 前 206 年	庚寅～ 乙未	秦始皇 嬴政～ 嬴子婴	二十六年～ 一年	民间疫气，死者万计。	秦国	《古今图书集成》 卷 540《医部·医 术名流列传·崔文 子传》
前 181 年	庚申	西汉 高后吕雉	七年	会暑湿，士卒大疫， 兵不能逾岭。	长沙边邑	《汉书》卷 95《西 南夷南粤朝鲜传》 第 65

〔1〕 痢：汉·何休注：“痢者，民疾疫也。”

公 元	干 支	朝 代	年 号	疫 情	地 点	资料来源
←前 163 年	戊寅	西汉 文帝刘恒	←后元元年	数年比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灾。	西汉境内	《汉书》卷 4《文帝纪》第 4
前 143 年	戊戌	西汉 景帝刘启	后元元年	民大疫死，棺贵，至秋止。	西汉境内	《汉书》卷 26《天文志》第 6；《陕西通志》
前 142 年	己亥	西汉 景帝刘启	后元二年	衡山国、河东、云中郡民疫。	衡山国、河东、云中郡	《史记》卷 11《孝景本纪》第 11
前 89 年	壬辰	西汉 武帝刘彻	征和四年	会连雨雪数月，畜产死，人民疫病，谷稼不熟。	匈奴境内	《汉书》卷 94 上《匈奴传》第 64 上
前 64 年	丁巳	西汉 宣帝刘询	元康二年	今天下颇被疾疫之灾。	西汉境内	《汉书》卷 8《宣帝纪》第 8
前 48 年	癸酉	西汉 元帝刘奭	初元元年	是岁关东大水，郡国十一饥，疫尤甚。	关东	《汉书》卷 75《睦两夏侯京翼李传》第 45
前 48 年	癸酉	西汉 元帝刘奭	初元元年	六月，以民疾疫，令大官损膳，减乐府员，省苑马，以振困乏。	关东	《汉书》卷 9《元帝纪》第 9
前 48～ 前 44 年	癸酉 ～丁丑	西汉 元帝刘奭	初元元年～ 五年	春凋秋荣，陨霜不杀，水旱螟虫，民人饥疫。	关东	《汉书》卷 75《睦两夏侯京翼李传》第 45
前 48～ 前 44 年	癸酉 ～丁丑	西汉 元帝刘奭	初元元年～ 五年	乃者，关东连遭灾害，饥寒疾疫，夭不终命。	关东	《汉书》卷 9《元帝纪》第 9
前 48～ 前 44 年	癸酉 ～丁丑	西汉 元帝刘奭	初元元年～ 五年	关东流民，饥寒疾疫。	关东	《汉书》卷 71《隽疏于平彭传》第 41
前 32～ 前 27 年	己丑～ 甲午	西汉 成帝刘骘	建始元年～ 河平二年	岁比不登，仓廩空虚，百姓饥馑，流离道路，疾疫死者以万数，人至相食。	西汉境内	《汉书》卷 83《薛宣传》第 53
前 32～ 前 19 年	己丑～ 壬寅	西汉 成帝刘骘	建始元年～ 鸿嘉二年	十有余年，数遭水旱疾疫之灾，黎民屡困于饥寒。	西汉境内	《汉书》卷 10《成帝纪》第 10
前 15～ 前 6 年	丙午～ 乙卯	西汉 成帝刘骘～ 哀帝刘欣	永始二年～ 建平元年	灾害并臻，民被饥饿，加之疾疫、溺死。	西汉境内	《汉书》卷 84《翟方进传》第 54